



夏鼐先生纪念文集

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夏鼐先生纪念文集

——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

K825.81

X195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夏鼐先生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2010年是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也是夏鼐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为纪念这位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一代大师，特将二十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和其他方面学者所写纪念夏鼐先生的有关文章，选编为本文集。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怀念夏鼐先生的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评述夏鼐先生多方面开拓性的学术成就和重要业绩。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科技史研究者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3-026240-0

I. 夏… II. 中… III. 夏鼐(1910~1985) - 纪念文集

IV. 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1395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 责任校对：鲁素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张放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年12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7 1/4 插页：4

印数：1~1500 字数：631000

定价：1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2010年是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逝世二十五周年。夏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一代大师，我们考古研究所将中国考古学界和其他方面学者所写纪念夏鼐先生的文章结集出版。

今天，我们深切缅怀夏鼐先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夏鼐先生离开我们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我们的国家乃至全世界，中国考古学界乃至国际学术界，都已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夏鼐先生所推崇、倡导的精神和作风并没有过时，他所为之努力奋斗一生的中国考古事业并没有停滞，更没有倒退。我们缅怀夏鼐先生，就是要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将他和其他老一辈考古学家共同开创的中国考古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此，我们要：

像夏鼐先生那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考古学的实际出发，积极吸收和借鉴国际学术界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进一步完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

像夏鼐先生那样，坚持为考古事业贡献毕生力量的献身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的生活、工作作风，自觉抵制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

像夏鼐先生那样，坚持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求真务实，抵制浮躁，老老实实地做人，扎扎实实地进行学术研究。

像夏鼐先生那样，坚持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确保考古发掘的质量。特别是在目前考古发掘中配合基建占较大比重，时间紧、任务重、工期短的情况下，这一点更为重要。

像夏鼐先生那样，坚持以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根本任务，透物见人，透物见社会，通过对考古遗存的认真发掘和系统梳理，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提供确切的科学资料，并以这些实物资料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

像夏鼐先生那样，大力加强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应用。凡是可应用于考古工作的现代科技手段，我们都要积极引进，充分发挥效力，使其走进世界先进行列。

像夏鼐先生那样，大力推进中外考古学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继续不断请进来的同时，尤其要努力创造条件，争取更好、更快地走出去，积极参与世界考古学

上重大热点问题的研究，充分发挥中国考古学家的潜力，做出无愧于伟大祖国的应有贡献。

像夏鼐先生那样，大力强化文物保护意识，在考古工作的各个环节，都要将文物保护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份内职责，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大遗址保护和其他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去，发挥考古学家的独特作用。

像夏鼐先生那样，大力加强考古人才的建设，切实关心青年专业人才的成长，高标准，严要求，放手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以期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思想坚定、业务过硬、学风朴实、视野开阔的考古工作队伍，使中国考古学后继有人，继往开来。

像夏鼐先生那样，大力维护中国考古学界的团结，以中国考古学的大局为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求同存异，协手前进。

2010年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在这个时候纪念夏鼐先生更有特别的意义。自1950年考古研究所成立以来，夏鼐先生在1962年以前是实际主持考古所各项工作的副所长，1962年至1982年担任考古研究所所长，1982年至1985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他领导考古研究所前后历时长达三十五年。夏鼐先生为考古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付出大量的精力，做出令人难忘的莫大贡献。可以说，考古所成立以来取得的重要业绩，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的声誉，都与夏鼐先生花费的心血密不可分。抚今追昔，我们对夏鼐先生为考古研究所乃至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充满由衷的钦佩和敬意，也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今后如何把夏鼐先生参与创建和直接领导三十多年的考古研究所继续办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我们深知，为了切实办好考古研究所，就要充分依靠全所干部职工，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夏鼐先生为榜样，发扬他所树立的治学、治所精神。同时，还要更好地与国家文物局和地方文物考古部门，以及相关的大专院校考古文博院系同行们协作，进一步争取他们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

让我们继承夏鼐先生的遗志，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推动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其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前进，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的贡献。

王 巍
2009年9月

目 录

前言	(i)
沉痛悼念夏鼐同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会 (1)
夏鼐先生传略	王仲殊 (5)
痛悼卓越的考古学家夏鼐同志	胡乔木 (15)
建议汇集出版纪念夏鼐同志的文章	钱学森 (17)
怀念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	王仲殊 (19)
为考古工作而献身的人——沉痛悼念夏鼐同志	安志敏 (26)
尽瘁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忠诚战士——夏鼐同志的学问、道德和事功	
.....	石兴邦 (29)
夏鼐 (1910 ~ 1985)	张光直 (41)
中国考古学路上不会消失的足迹——悼念夏鼐先生	张忠培 (44)
悼念旷世的考古历史学家夏鼐	徐贤修 (49)
平生风义兼师友——悼夏鼐同志	袁翰青 (53)
悼念夏鼐公	阎文儒 (55)
悼念夏鼐氏	末永雅雄 (57)
悼念夏鼐先生	三上次男 (59)
忆夏鼐先生二三事	李汝宽 (61)
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	樋口隆康 (64)
书夏鼐先生讲演集后	冈崎敬 (70)
永远怀念夏鼐先生	邹 衡 (73)
忆夏鼐先生对我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关怀与指导	安金槐 (76)
夏鼐老师与定陵发掘	赵其昌 (81)
忆夏鼐先生对湖北文物考古工作的关怀	谭维四 (85)
忆夏鼐先生在马王堆汉墓发掘工作中	侯 良 (88)
深情怀念夏鼐教授——教我从事古尸科研的启蒙老师	彭隆祥 (92)

夏鼐先生与广州文物工作二三事·····	麦英豪 (98)
我所知道的夏鼐先生·····	徐莘芳 (104)
夏鼐先生的三封书信——纪念夏鼐先生逝世十周年·····	罗宗真 (111)
夏鼐先生的一封复信——纪念夏鼐先生逝世十周年·····	李仰松 (114)
求实、踏实、朴实——纪念夏鼐同志·····	吴德铎 (117)
无私才能献身·····	楼宇栋 (120)
仰之弥高，德音不瑕——缅怀夏鼐先生·····	卢兆荫 (122)
追忆和夏鼐先生相处的日子·····	赵 铨 (126)
随夏鼐所长 1978 年和 1980 年两次出访·····	张长寿 (129)
难忘的往事——纪念夏鼐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黄展岳 (132)
缅怀尊敬的夏鼐先生·····	郑振香 (138)
永远怀念敬爱的夏所长·····	仇士华、蔡莲珍 (144)
聆听教诲沁心脾——记夏所长两次视察偃师商城发掘现场·····	赵芝荃、徐殿魁 (147)
永远的怀念——写于夏鼐先生百年诞辰之时·····	叶小燕 (152)
忆夏作铭师·····	杨 泓 (157)
点燃文物复原的火花——怀念夏鼐先生·····	白荣金 (162)
继承夏鼐先生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	高 炜 (168)
夏鼐先生与新中国文物出国第一展·····	雷从云 (171)
夏鼐与张光直交往的一点史料·····	陈星灿 (177)
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	王仲殊、王世民 (182)
夏鼐先生行传·····	石兴邦 (197)
夏鼐先生的事功和品德永载史册——纪念夏鼐先生逝世十周年·····	任式楠 (212)
夏鼐先生与中国史前考古学·····	周 星 (216)
夏鼐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朱乃诚 (223)
夏鼐先生对中国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	杨 泓 (246)
夏鼐的丝绸史考古研究·····	梁家农 (266)
夏鼐先生在中西交通史考古研究中的巨大成就·····	刘庆柱 (268)
中国“埃及学之父”夏鼐·····	颜海英 (278)
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	姜 波 (287)
夏鼐和傅斯年的师承与别离·····	王世民 (304)
夏鼐先生的英伦之缘·····	费尔德、汪 涛 (310)
对《夏鼐先生的英伦之缘》一文的几点补充·····	汪 涛 (315)

夏鼐与第一次院士选举	罗 丰 (321)
夏鼐发现敦煌汉简和晋泰始石刻的经过	邢义田 (332)
夏鼐的足迹	张天来、金 涛 (339)
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李秀君 (374)
我们的父母亲	夏素琴等 (396)
附录	
新华社关于夏鼐逝世的报道	(406)
新华社关于向夏鼐同志遗体告别的报道	(407)
《考古》杂志关于向夏鼐同志遗体告别的报道	(409)
夏鼐先生学术活动年表	(413)
编后记	(426)

沉痛悼念夏鼐同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会

我国杰出考古学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夏鼐同志，因患脑溢血，经多方抢救无效，于1985年6月19日下午4时3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夏鼐同志是浙江省温州市人，生于1910年2月7日。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5年至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后获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后，历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从1959年起被选为第二届至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74年起，先后被授予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等称号，成为我国学术界接受外国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夏鼐同志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通过新中国考古队伍的建设、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田野考古工作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应用，以及文物保护工作的加强等方面，对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迅速扩大考古工作的队伍，从1952年起至1955年，由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夏鼐同志

* 本文原载《考古》1985年第8期。

参与训练班的筹划和组织领导，并亲临考古实习现场，讲授田野调查发掘方法。以后他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考古学通论。他坚持田野发掘是考古研究的基础，在五十年代亲自率领发掘队，进行辉县、长沙和黄河水库区等地的重要考古调查发掘。1956至1958年，他主持了北京明定陵的发掘，亲自参加具体的操作。多年来，他经常在野外工地夜以继日地工作，连星期天也不休息。1974年，他又对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进行现场指导。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调查发掘工作，造就了新中国的大批考古人才，使中国考古学的科学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在文物保护工作方面，夏鼐同志也倾注了巨大的精力。为保护我国宝贵的民族遗产，他长期和各种破坏文物的错误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81年至1982年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过程中，他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使《文物保护法》制定得更加完善。为了更好地贯彻《文物保护法》，他又多次召集国家文物委员会会议，审核重大的考古发掘项目，检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情况，加强文物保护的计划措施，制止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使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

夏鼐同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考古学对我国古代文明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中国史前考古学方面，他通过1945年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瑞典人安特生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的错误论断，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1977年他利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测定的大量碳-14年代数据，写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论文，就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得出可靠的结论。在商周考古学方面，他通过1950年在河南辉县的发掘，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比安阳殷墟为早的商代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了对商文化的认识。1951年春，他通过在河南郑州的调查，首次确认二里冈遗址为早于安阳殷墟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1951年秋，他通过湖南长沙的发掘，究明了当地战国时代墓葬的演变过程，为楚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方面，他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后期发表了《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等一系列论文，编集为《考古学和科技史》一书，创造性地利用考古学的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阐明中国古代在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各个科技领域中的卓越成就，为中国科技史的考古学研究作出重大的贡献。关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方面，他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了《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等论文，根据中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及其他具有外国风格的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在经济和文化上

的联系，并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创见。

夏鼐同志的论著极其丰富，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共计 224 种，编集为专书的有《考古学论文集》（1961 年）、《考古学和科技史》（1979 年）、《中国文明的起源》（1984 年，日文）、《汉代的玉器和丝绸》（1984 年，英文）等。他还主持编写了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年和三十年考古工作成果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 年）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 年）两部综合性著作。1979 年以来，他又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卷的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通过全国考古学界几年来的努力，最近完成了全书的编写和定稿工作，突出地显示了我国考古研究的巨大成绩。建国后，我国的考古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中成就最大的学科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这是同夏鼐同志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

夏鼐同志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工作，接待过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考古学者和代表团。他的渊博的学识，谦逊的态度，热爱祖国文化传统以及维护民族尊严的立场，给国外学术界特别是考古学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接受邀请，到日本、泰国、巴基斯坦、伊朗、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英国、法国、瑞士、德国、瑞典、美国、秘鲁、墨西哥等许多国家去考察、讲学或参加国际会议。通过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外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而他本人的学术成就在国际上受到普遍重视，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夏鼐同志从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全心全意献身科学事业，大公无私，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人正直，表里如一，是广大知识分子的楷模。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竭诚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维护党对考古工作的正确领导，掌握考古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而日夜操劳。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夏鼐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严肃认真地对待各种学术问题，勤勤恳恳，一丝不苟。他治所严谨，要求全所同志在田野发掘工作中必须认真执行操作规程，遵守工作纪律。他还规定，全所工作人员，个人不得购买、收藏文物。对于任何业务工作，他总是亲自动手，严格把关，深入实际，身体力行地为中国考古学界、为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优良的学风。他平易近人，经常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耐心、细致地帮助别人解决工作上的各种问题。夏鼐同志又是克己奉公的模范，他不仅从不多花国家的一分钱，而且还把国外友人赠送给他个人的许多贵重的图书资料、文物标本和仪器等，转赠给考古研究所。多少年来，夏鼐同志一直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他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三万元人民币捐赠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作为面向全国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奖金的基金，以促进中国考古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近年来，夏鼐同志的体力已经不如以前，但他仍然坚持每天上班，继续从事学

术研究，主持和出席各种会议，关心各项行政领导工作，参加频繁的外事活动。在今年3月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夏鼐同志提出“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的号召，要求广大考古工作者不怕吃苦，不计较个人的经济利益，一心一意为提高中国考古学的科学水平而奋斗。夏鼐同志本人正是这种献身精神的榜样，他为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孜孜不倦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毕生为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而工作，在他身上就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光辉和力量。

夏鼐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他的未竟事业，在社会科学研究战线上，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繁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而努力奋斗！

夏鼐先生传略*

王仲殊

一

夏鼐先生字作铭，1910年2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府永嘉县（今温州市）。1927年以前在温州上私塾、小学和初中，1927年9月到上海上高中。1930年高中毕业后，他来到北京，进燕京大学，次年又转入清华大学求学。1934年7月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同年10月初，他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的考古学部门，以求出国深造，学习近代考古学。

按照当时的规定，出国前要在国内准备并实习一年。因此，他于1935年春以实习生的身份在河南省安阳参加由梁思永先生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墓群的发掘，与梁思永、石璋如、尹达、胡厚宣等相过从，在实际工作中学得许多考古学的知识和技术。这一年，便是夏鼐先生开始从事考古工作的一年。

1935年夏，夏先生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改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那时，伦敦大学主持田野考古学课程的彼特利（W. F. Petrie）教授已经退休，其职位由惠勒（M. Wheeler）教授继任。夏鼐先生在留学期间，参加了由惠勒领导的梅登堡（Maiden Castle）山城遗址的发掘，颇受教益。他又随同英国调查团到埃及，在阿尔曼特（Armant）参加调查发掘，接着还到过巴勒斯坦，在泰尔·丢维尔（Tell Duweir）参加发掘工作。当时，彼特利教授正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城的医院中疗养。夏鼐先生在那里访问了彼特利，并接受他的指教。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州爆发，夏鼐先生由英国经埃及返国。他在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一年余，才取道西亚、印度、缅甸，于1941年初抵达昆明（他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是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授予的）。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由南京迁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夏鼐先生回国后不久，便在该处任专门委员之职。1941年夏至1942年，他和吴金鼎、

* 本文原是为编辑出版《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而撰写的，夏鼐先生在世时曾亲自过目。夏鼐先生逝世后，也曾在《考古》1985年第8期发表。

曾昭燏、高去寻等调查并发掘了四川省彭山县豆芽房和寨子山的崖墓。1943年，夏先生转入由南京迁到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被任为副研究员。1944年至1945年，他和向达先生等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省境内的考古工作，调查、发掘了敦煌的佛爷庙、月牙泉、玉门关，宁定的阳洼湾，民勤的沙井，武威的喇嘛湾，临洮的寺洼山，兰州的高坪、中山林、太平沟、十里店等遗址和墓地，有许多重要的收获。在发掘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时，他在墓坑填土中发现仰韶文化的彩陶片，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从而否定了安特生(J. G. Anderson)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这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不得不停止。这时，中央研究院已迁回南京，夏鼐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副研究员升任研究员，主要是从事室内研究工作。1948年冬到1949年春，中央研究院所藏图书、文物资料被迁运到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的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都随着殷墟出土的文物由大陆去台湾。夏先生当机立断，决意留在大陆。1949年秋全国解放，他曾一度应聘在杭州的浙江大学任教授。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在北京创立中国科学院，由郭沫若先生任院长。1950年夏，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根据郭沫若院长的提名，周恩来总理任命郑振铎先生为所长，梁思永和夏鼐先生为副所长。这样，夏先生便于同年9月由杭州来到北京，协助郑振铎、梁思永主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由于郑振铎主要是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任局长，梁思永又经常患病，夏先生承担了考古研究所的主要业务领导工作。他到任不满一个月，便组织了一个发掘队，前往河南省辉县，进行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一次发掘。发掘队由夏鼐先生任队长，郭宝钧任副队长，苏秉琦任秘书长；队员有安志敏、王伯洪、石兴邦、王仲殊、马得志、赵铨等，他们多是初次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夏先生为了训练这些年轻的新手，花费了极大的心力。在辉县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了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迹，从地域上和年代上扩大了对商文化的认识。从这一年的12月到次年的1月，夏鼐先生亲自手执小铲，在琉璃阁发掘战国时代的车马坑，在冰雪严寒中成功地剔掘出十九辆大型木车的遗存，初次显示了新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高度的重视和好评。

1951年春，夏鼐先生率领安志敏、王仲殊、马得志在河南省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广泛的调查发掘。他在郑州确认二里冈遗址为早于安阳殷墟的又一处重要的商代遗址。经过对浞县仰韶村遗址的再发掘，他进一步指出该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的

遗存，而且也有龙山文化的遗存，从而为探求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线索。在各处的调查发掘中，他把田野考古的方法传授给年轻的助手们，指示他们严格划分土层，正确判定层位关系，仔细辨认土色、土质，不放过任何细微的现象。在成皋县青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继红烧土和白灰面等居住遗迹的发现之后，他亲手从土层中发掘出许多轻易不能辨认出来的柱子洞，使助手们懂得发掘居住址的难度更在发掘一般墓葬之上。夏先生对大家说，考古工作者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他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要看他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他告诫大家不要有“挖宝思想”。他经常说，居住址出土的遗物多是破碎的陶片，但居住址的研究价值却往往胜过包含着珍贵随葬品的墓葬。先生身体力行，使大家懂得必须在调查发掘工作中坚持亲自操作，既要学会认土、找边、剥人骨架，又要学会照相、绘图和测量。每天晚上，他都要检查大家的记录是否及时完成，记录的内容有无差错。遇到星期天，他带头用毛笔蘸墨在每一块陶片上书写出土坑位和层次的编号。夏鼐先生的这种工作作风，为此后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1年秋，夏鼐先生又带领考古研究所的安志敏、王伯洪、石兴邦、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等到湖南省长沙去发掘战国和两汉的墓葬。这使得研究所的调查发掘重点在年代上从石器时代、商代延长到汉代，在地域上从北方的黄河流域扩展到南方的长江流域。这次工作的成果在于通过大量墓葬的发掘，究明战国至两汉墓葬制度的演变过程，确定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分期，而楚文化的特点也得到了初步的阐明。当时，许多人把马王堆汉墓看成是五代十国时楚国马殷的墓。经过实地考察，夏鼐先生确认它们是汉墓。他的这一判断，为二十年后的正式发掘所证实。

随着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事业的发展，配合各种建设工程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的任务越来越大。为了应付这一严重的局面，并为了使新中国的考古队伍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历史系）自1952年至1955年联合举办了四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每届为期三个月。学员们来自全国各省区的博物馆和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每届人数各达一百数十人之多。夏鼐先生和裴文中、向达、郭宝钧、苏秉琦先生等都参与训练班的组织领导工作，制定室内授课和野外实习的计划，而野外实习则是每届训练班的训练重点所在。安志敏、王仲殊、王伯洪、石兴邦先后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宿白一同负责教务处的具体工作，也参加授课，并担任野外实习时的辅导员。从1953年的第二届训练班起，夏先生每次都亲临实习的现场，讲授田野调查发掘的方法。实习时所进行的发掘工作，规模往往相当大。西安附近的半坡遗址便是1954年第三届训练班实习时开始由石兴邦主持发掘的，这一发掘工作为大面积揭露新石器时代遗址开创了良好的先例。1956年冬，在夏鼐先生的领导下，继四届全国性训练班之后，在考古研究所内部也举办了一次训练班；由教师们的讲义汇编而成

的《考古学基础》一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全国青年考古工作者必读的手册。在历届训练班获得成功的基础上，1956年至1958年，集中了考古研究所和全国各有关单位的近百名考古工作者，组成庞大的考古队，由夏鼐先生任队长，安志敏任副队长，在河南省陕县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工程，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56年，北京昌平区境内的明定陵的发掘工作开始了。应该说明，这项发掘工作是由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提议的。他研究明史，对发掘明陵特别感兴趣。当初，夏鼐先生和郑振铎一样，不主张发掘明陵。但是，由于吴晗的坚持，终于将发掘计划上报国务院并获得批准，使夏先生不得不把这副重担挑起来。按照最初的计划，是要发掘长陵。经过再三协商，为了慎重起见，才决定先以定陵为试掘对象。对于发掘规模如此巨大的帝陵，大家都没有经验，不知发掘从何处入手才好。1956年5月的一个下午，夏鼐先生到现场察看。他发现定陵宝城西南方外侧的砖壁有一些隙缝，以此为契机，又发现内壁石块上刻有“隧道门”字样，便判断这里是当初再次入葬时的通道所在，决定发掘在此下手。这使得定陵的发掘作业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顺利。打开地宫以后，为了观察各种现象，特别是为了处理各种遗物，夏鼐先生终日深入地下的玄宫内工作，达三四个星期之久。正是由于先生的这种忘我的精神，才使得这一帝陵的发掘工作得以顺利结束。但是，经过这次工作，他进一步感到发掘帝陵的条件不成熟，有些珍贵的随葬品难以妥善保存，从而更加强了帝陵不宜过早发掘的看法。因此，定陵试掘之后，长陵的发掘计划也就作罢了。1961年，国务院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意见，向全国发布通令，不准随意发掘帝王的陵墓。以后，郭沫若院长曾有发掘唐乾陵的设想，也因夏鼐先生持异议而没有付诸实现。郭院长俯从夏所长的意见，至今被传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佳话。

夏鼐先生充分认识到发掘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重要性和工作的长期性。因此，早在1954年，考古研究所就在河南省的洛阳建立工作站，在陕西省的西安建立研究室。不久，便在洛阳地区开始发掘东周的王城、汉魏的洛阳城和隋唐的洛阳城遗址，在西安地区开始发掘西周的丰镐、汉代的长安城和隋唐的长安城遗址。他把发掘任务交给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等年轻的一代。为了表示重视，他还亲自兼任西安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考古研究所又在河南省安阳建立工作站，为殷墟发掘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偃师县二里头发现早商的遗址，也因洛阳工作站已经建立，所以能顺利地进行发掘。大规模的都城遗址的发掘，使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二十余年后的今天，除上述各都城遗址继续进行发掘外，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于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发现了一处早商都城（很可能是西亳）的遗址，城墙、城门、街道、宫殿等遗迹保存得十分良好，使中国古代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达到了最高潮。

三

1954年夏，梁思永先生因病逝世；1958年秋，郑振铎先生又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尹达先生来研究所兼任所长，但因他必须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上，而且在其他外单位兼职过多，加上身体较弱，不能经常前来主持所务。1962年春，夏鼐先生终于继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从此年以迄1982年，他任所长之职达二十年之久。

繁忙的行政事务工作占去了先生的大部分时间，但他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后期，夏鼐先生先后写出《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元安西王府址和阿拉伯数码幻方》、《新疆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晋周处墓出土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学和科技史》、《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等许多论文，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归纳起来，其主要成果表现在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和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两大方面。在前一方面，他根据中国各地出土的丝织品、外国货币及其他具有外国风格的遗物，阐明汉唐时代中国与中亚、西亚，特别是与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并对中西交通的路线提出重要的创见。在后一方面，他创造性地利用各种考古学的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精辟地阐明中国古代在天文、数学、纺织、冶金和化学等各个科技领域中的成就，在充分肯定这些成就对世界文明所作贡献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切实际的虚夸。他指出江苏省宜兴周处墓出土的带饰是银制品而不是铝制品，纠正了早在三世纪的西晋中国便能提炼铝的错误说法。他又指出河北省藁城商代遗址出土的铁钺是用自然的陨铁而不是用人工冶炼的铁料制成，否定了早在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商代中国已进入铁器时代的错误结论。夏鼐先生卓越的研究成果和慎重、诚实的治学态度，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钦佩和赞扬。

先生精通英文，也粗通法文。他早年学过日文，懂得基本文法，因为精通英文，所以除了汉字以外，还熟知日文中的外来语。正是由于具备这些语文上的条件，他能博览外国的书籍，通晓国际学术界的各种动态和研究成果。他从事考古研究，从调查发掘出发，以实物资料为主要依据，同时对中国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外国的）各种古代文献又几乎无所不通。他将中国传统的文史学、金石学等与外国传人的近代考古学结合起来，使他的研究工作具有广泛而深厚的基础，既能追求现代的国际水平，又能发挥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